

延續與差異：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為視角

蔡永君 何偉鴻

[摘要] 以 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當選議員組別背景為視角，本文利用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獲得的有效票數，計算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並且側重以本屆（2021 年）當選組別為對象，分析和比較當選組別在各區域的“吸票”能力，瞭解各組別的得票是否具有區域性差異，以及有關“吸票”能力和競爭力是否具有持續性，藉以探討不同社經背景選民在投票取向上與候選組別背景的關係。本文發現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大致相近的情形下，不同組別在各區的得票情況大相逕庭，而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同時，在區域的“吸票”能力和競爭力分佈上則保持較高的穩定性。

[關鍵詞] 立法會選舉 組別背景 區域性得票

2021 年舉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延續了過往兩屆（2013 和 2017 年）的立法會議席數和分佈比例，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對《2013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予以批准和備案後，修訂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使立法會直選和間選議席各增加至 14 和 12 席，委任議員維持 7 名，議員人數合共 33 名。本屆立法會選舉共有 19 組直選組別的候選名單，共有 159 名候選人，及後經選舉管理委員會審查後，有 5 組未能符合資格，最終共有 14 組候選名單和 128 名候選人。

在六屆立法會選舉後，筆者於 2017 年第 4 期《澳門研究》發表了《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一文，該文以當選議員的組別性質為視角，比較 2013 和 2017 年的立法會選舉，剖析當選組別的背景與其總體及區域性得票的關係，以瞭解選民社經背景在投票取向的影響性。本文將以相同的研究框架，加入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將 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選舉作比較，以作追蹤研究之用，透過本文，可更清晰地瞭解澳門立法會直選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吸票能力”與“競爭力”，以及相關趨勢。

作者簡介：蔡永君，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法學博士；何偉鴻，澳門基金會技術員、管理學博士。

一、2021 年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背景和政綱分析

從主要候選人的職業來源、社團背景和服務群體劃分，這三屆立法會直選中候選組別可分為七大類，包括扎根和長期服務基層的傳統社團；商界（包括具博彩業背景或鄉族社團背景）；公職人員；被視為“民主派”的民主民生社團；獨立於傳統工人社團的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以及開展針對青年、老人等服務的社會服務背景人士。

雖然 2021 年選舉的候選組別有所減少，但總體背景來源相對穩定，包括傳統社團；商界（鄉族社團）；公職人員；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青年組織。本屆當選的候選組別佔總體有效票數的 93.5%，比過往兩屆大幅增加（2013 年為 85.48%，2017 年則是 84.47%）。而當選門檻方面，本屆為 6,649.75 票，較上一屆的 8,348 票下降 20.3%，與 2013 年相若（6,565 票），獲得議席的組別數目由上屆的 10 組減至 7 組。

本屆新增選民 18,292 人，投票率為 42.38%，而各候選組別中，競選連任的有一組未能當選，同時有一新組別成功入閣（表 1）。

本文以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對各組（以背景劃分）作簡要分析，由於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的版面有限（兩版），給予各候選組別平等的政綱宣傳機會，因此可理解為各組別把其最重要的理念或欲宣傳的想法放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內。

從這三屆的政綱來說，以比例來看，“民生類別”在各背景的組別中佔比較重，顯示其在各組政綱中所佔的重要性，當中，鄉族（商界）的政綱從過往側重“民生類別”的議題轉為更多為“社會服務”類別，“傳統社團”的政綱在歷屆中“民生類別”的比重相對平均，公務員／土生的組別則在“政府與行政”的內容上較其他背景的組別涉獵為多，相對地，過往博彩業（商界）組別則明顯在經濟議題上較其他組別着墨更多，而本屆“青年和專業人士”背景組別對“城市環境”的議題較為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三屆的政綱內容作分析，屬“社會服務”的議題在各背景組別中的出現比例有所提高，當中，“醫療衛生”為一個重點，同時，以細項劃分，因應經濟環境轉弱，除了過往三屆均佔超過九成比例的“土地與房屋”問題外，“勞工與就業”亦是本屆各組重點闡述的部分。此外，由於擁有青年社團背景的競選組別有所增加，眾多組別也把政綱重點放在青年人的發展和支援上，有關“青年”內容的比重較過往屆別大幅度提高（表 2）。

表1 2021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

| 組別 | 主要候選人 | 背景 # | 上屆議員 ^ | 首次參選 * |
|------------------------|---------|-----------|--------|--------|
| 第1組：澳粵同盟 | 鄭安庭、羅彩燕 | 商界、鄉族社團 | 是 | 否 |
| 第2組：公民監察 | 林玉鳳、趙雲橋 | 專業人士 | 是 | 否 |
| 第3組：澳門民聯協進會 | 施家倫、宋碧琪 | 商界、鄉族社團 | 是 | 否 |
| 第4組：滙青平台 | 梁偉明、潘立峰 | 專業人士、青年社團 | 否 | 是 |
| 第5組：澳門發展力量 | 陳德勝、高勝文 | 社會服務界 | 否 | 是 |
| 第6組：傳新力量 | 林宇滔、甄慶悅 | 專業人士 | 否 | 否 |
| 第7組：言起新力量 | 蔡文政、黎安娜 | 青年社團 | 否 | 是 |
| 第8組：群力促進會 | 梁鴻細、顏奕恆 | 傳統社團 | 否 | 否 |
| 第9組：美好家園聯盟 | 黃潔貞、馬耀鋒 | 傳統社團 | 是 | 否 |
| 第10組：澳門公義 | 何潤拱、馬國財 | 新興基層組織 | 否 | 否 |
| 第11組：同心協進會 | 李靜儀、梁孫旭 | 傳統社團 | 是 | 否 |
| 第12組：思政動力 | 葛萬金、李秋玲 | 公職人員 | 否 | 否 |
| 第13組：澳門基本法推廣 宣傳工作聯盟 | 周新政、黃鐵軍 | 專業人士 | 否 | 是 |
| 第14組：新希望 | 高天賜、謝誓宏 | 公職人員、土生葡人 | 是 | 否 |

註：灰階為當選組別；

以總體各候選人的職業、社團背景等作衡量；

^ 組別內任何候選人為2017—2021屆別的議員將視作為“上屆議員”；

* 以候選組別作劃分標準。

2013及2017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請參考：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第46—47頁。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同時，筆者整理了各候選組別所派發的宣傳單張，藉以進一步瞭解候選組別的政綱內容和方向。總體來說，由於整個澳門為單一選區，候選組別政綱傾向為“包羅萬有”、“面面俱到”，各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並不太突出。然而，從2013、2017和2021年直選中各組別提出的詳細政綱，也能窺見其在政綱的側重點上具有明顯的差異化。除了是保障就業、加快增建公共房屋、改善交通、提升社會福利等重點外，政綱所涵蓋的範圍有所擴大，包括更多提及“城市規劃與都市更新”、“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等議題，而經歷天鴿和山竹等颱風對社會造成的巨大破壞後，“治水防災”成為了本屆各組政綱的熱點。

表 2 2021 年澳門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出現比例，1=100%）

| 組別 \ 類別 | 經濟類別 | 民生類別 | 政府與行政 | 社會服務 | 文教體育及青年 | 專業 | 城市環境 | 其他 |
|---------|------|------|-------|------|---------|------|------|------|
| 鄉族（商界） | 0.30 | 0.38 | 0.13 | 0.80 | 0.13 | - | 0.33 | 0.13 |
| 公務員／土生 | 0.30 | 0.38 | 0.38 | 0.40 | 0.50 | - | 0.17 | - |
| 傳統社團 | 0.40 | 0.75 | 0.33 | 0.40 | 0.33 | 0.17 | 0.56 | 0.08 |
| 青年及專業人士 | 0.44 | 0.40 | 0.30 | 0.40 | 0.30 | 0.50 | 0.60 | 0.20 |
| 社會服務及其他 | 0.40 | 0.38 | 0.38 | 0.50 | 0.13 | 0.00 | 0.83 | - |

註：筆者把候選的 14 組政綱的內容分類為 31 個類別，並歸類為 8 大範疇，當中，由於今年的政綱內多有提及治水等防災的部分，以及提及國家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內容，因此較原來的 28 個類（2013 和 2017 年）有所增補，於“城市環境”加入“防災”，“其他”加入“國安”及“食安”。

經濟類別：博彩業、經濟、勞工與就業、區域合作、人口政策／移民

民生類別：交通、房屋與土地、專營與物價、治安

政府與行政：公共管理、公務員、公共財政、廉政審計

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老人、婦幼、其他弱勢群體

文教體育及青年：教育、文化、體育、青年

專業：法律、專業

城市環境：城市建設與規劃、環保、防災（新增）

其他：政制、動物保護、國家安全（新增）、食物安全（新增）

2013 及 2017 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請參考：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48—49 頁。

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2021 年立法會選舉候選名單政綱概要》（直選）。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為此，因應候選組別的背景，政綱也具有一定的針對性，例如具博彩業背景的組別在政綱中以較大篇幅關注博彩業發展和從業員的利益；公職人員背景的組別特意獨立列出對公共行政領域議題和公職人員福利的主張；以婦女團體為背景的候選組別在政綱中強調為婦幼和家庭爭取權益。

同時，從縱向的視角上窺見，部分直選組別在政綱上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例如持續提出“全民基金”，又或在取得的往績上，進一步提出延伸的政策措施內容。

由此可見，雖然各組別總體上為了爭取更大比例的市民認同，政綱內容大致較為相近，但隨着社會利益的分化和日漸複雜多變的社會議題，各組別政綱內容也滲多樣化的路向發展，且越趨明顯。

二、2013、2017 和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結果的區域性分析

(一) 區域的劃分和特徵

歷史上，自葡萄牙人來澳定居和實施行政管理以來，澳門半島以各居民區內具代表性的教堂名稱命名的堂區，成為澳門政治行政生活中的一個單位，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方便行政管理的指引功能，^①縱然現時堂區劃分在公共行政或社會管理的實效不大，但在統計暨普查局統計上仍以堂區劃分作為區域數據的單位，事實上，不同堂區／區域在總體人口特徵、社會構成和經濟發展情況也有相當的差異，形成區域性的特定社經背景，由於《2021年人口普查》之數據暫未公佈，本文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相關各堂區的人口特徵數據，並因應2021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數字，將澳門各堂區／區域的人口和社經特徵更新如下（表3）。

表3 澳門各堂區／區域的人口和社經特徵

| 堂區／區域 | 特徵 |
|-------|--|
| 花地瑪堂 | <p>是澳門半島最遲開發的區域，由於毗連中國大陸，20世紀70年代末從中國大陸遷徙來澳的廣東和福建籍基層移民大多聚居於此，是澳門半島面積最大（未計算新城A區）、人口最多的堂區，也是傳統上直選的最大票倉，2020年底（下同）登記選民數達14.4萬人，約佔全澳選民人數近四成半，而以出生地劃分，該區64.9%的選民出生地為中國內地。</p> <p>人口的平均年齡相對較低，人口學歷水平偏低，除路環外小學學歷比例為全澳最高的區域（17.8%），具大學學歷比例則是各區中最低（17.3%），但學歷水平較2011年人口普查時已大為提高（其時為10.5%）。該區的已婚比例僅低於路環區，為全澳第二高，達65.7%，就業人口中從事博彩業的比例為各區之冠（達26.9%），而從事製造及建築業則僅低於路環區，佔14.7%。</p> |
| 聖安多尼堂 | <p>是澳門半島主要的商住和傳統工業區，區內以舊式低層樓宇為主，亦是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2020年為124,090人／平方公里），是直選的第二大票倉，佔全澳選民人數四分之一（約7.7萬人）。</p> <p>居民以本澳出生較多（43.5%），學歷水平僅高於花地瑪堂區，15.7%取得小學學歷，而具大學學歷的為22.9%（略低於全澳23.1%的水平）。居住人口中超過三成就業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p> |
| 望德堂 | <p>是澳門半島面積最小（0.6平方公里）且人口最少（2020年為33,200人）的堂區，其北部和東部是較高級的住宅區，選民人數2萬人，是澳門各區中選民人數最少。</p> <p>人口老化程度較高，平均年齡是各區之首，65歲以上的人口佔14.0%，50歲以上中老年居民比例也較高（達37.4%）。本地出生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51.4%，全澳總體為40.8%）。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達28.3%，僅低於氹仔區。區內從事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專業人士）；以及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公職人員）的人口比例為各區之首，是中產人士聚居的區域。</p> |

^①陳震宇：《澳門的行政堂區——兼議市民服務中心的可行區劃》，《行政》（澳門）2008年第1期總第79期，第19—33頁。

| | |
|-------------------|---|
| <p>大堂</p> | <p>西部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商業區，中部是澳門自 20 世紀 80 年代崛起的商業中心區，而南部的填海區（皇朝廣場一帶）則是新興的商住社區，其面積雖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中第二大，但人口密度卻是最小，選民人數約 2 萬人。</p> <p>20—29 歲人口比例較高，居民出生地以中國大陸佔多，比例僅次花地瑪堂區和路環。具高中學歷的人口所佔比例最多（30.6%），也遠高於總體水平（26.3%），而具大學學歷的比例也較高（28.1%）。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35.0%）。以職業身份劃分，該區僱主比例為各區之首（5.5%），遠高於全澳 3.1% 的水平，可視為澳門中小企業主居住的集中地。</p> |
| <p>風順堂</p> | <p>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區域，區內建築主要是商住混雜的低層樓宇，西面是密集的中低端住宅區，南面則是澳門的高尚住宅區，選民人數約 2.8 萬人，在各堂區中，與上屆 2017 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數比較，其增幅最少，只有 2.4%。</p> <p>區內 65 歲或以上居民佔人口比例為 11%，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中僅次望德堂區，居民平均年齡也僅次望德堂區，人口中以本澳出生居多（44.2%），學歷水平與總體相若，就業人口中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為各區最高（37.6%），遠高於總體的 31.6%。</p> |
| <p>氹仔</p> | <p>是澳門近年發展最為迅速的區域之一，人口達 11 萬，選民人數約 2.8 萬，較上屆的 2.4 萬增加了 14.9%。</p> <p>平均年齡是各區中最低（34.7 歲），50 歲或以上人口比例也是各區中最低（21.7%）。由於對比澳門半島是新發展區域，區內樓宇大部分為中高端的高層住宅群，吸引中產家庭居住，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從事專業領域（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和為公職人員（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的就業人口比例僅次望德堂區。部分原因是該區外地人口較多，選民登記比例遠低於其他各區（僅 25.4%，總體為 47.6%），而各屆投票率亦相對偏低。</p> |
| <p>路環</p> | <p>原是澳門的“市肺”，開發程度最低，然而，隨著石排灣公共房屋群的落成，以及大型住宅項目的開發，人口由 2011 年的 4,200 多人倍增至 2020 年的 32,000 多人，但選民人數僅約 6,100 人，佔人口比例低於二成（18.9%）。</p> <p>人口中 65 歲以上的比例為各區中最高（14.5%），遠高於總體的 9.1%，在中國內地出生比例較高（45.6%），小學學歷比例為各區中最高，但具大學學歷比例與總體水平持平，已婚人口的比例也是全澳最高。就業人口中約 1/6 從事製造業及建築業，位列各區首位。</p> |

註：* 指 20 至 29 歲的人口，《選民登記法》規定年滿 17 歲的居民可提前登記成為選民，但因統計資料沒有提供 17—19 歲歲組的分區統計人數，因此忽略不計。

資料來源：選民數據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選民登記網站 <http://www.re.gov.mo/re/public/index.jsf>；人口特徵、出生地、婚姻狀況和就業分佈見《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由於《2021 年人口普查》之數據暫未公佈，因此有關分區的人口特徵最後更新至 2016 年；地理面積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網站，https://www.dscc.gov.mo/zh-hant/geo_statistic_web2.html。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二) 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方面，2013及2017年澳門立法會各直選組別在各投票站的得票數據來自《2013年選舉活動綜合報告》及《2017年選舉活動綜合報告》，2021年則因立法會直選官方網站僅公佈以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劃分的各組得票數，本文以筆者在選舉日及翌日凌晨（2021年9月12至13日）於澳門、氹仔及路環各投票站門外公佈的各組得票數據作為相應的得票計算。^①由於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投票人士分別為在囚人士和間選選民（可同時於此票站作直選投票），其投票取向與選民社經背景及人口特徵關係不大；同時本屆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選舉管理委員會為正在進行醫學觀察的選民設立了3個流動站，上述票站不列入本文區域性之分析，而整體性和組別得票集中程度分析則包括在內。

本文採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②以及T—檢定，分析2013、2017及2021年立法會選舉結果。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一般用於集中不均的評估，例如市場集中（market concentration），以分析其競爭的激烈程度。Owen等學者嘗試運用HHI分析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之間的競爭程度，^③Fuchs分別通過計算不同檢索引擎網站（如Google、Bing、Baidu、Yahoo）和第三方平台（如Facebook、WeChat等）全球活躍用戶所佔的比例，以便分別計算其HHI值，從而評估網上廣告市場競爭和集中程度。^④上述指數有助評估最近三屆澳門特區立法會直選的競爭程度。

標準化發生比SIR主要評估某一個特定事件在整體人口發生機率，與整體預期平均發生機率之間的一個比較值，這個比較值不受國家人口大小、案例所影響，一般用於評價或比較國家或地區某一種疾病發生機率是否處於一個正常值，Deborah C Glass、Anthony Del Monaco、Sabine Pircher等學者在探討澳大利亞男性消防員志願者患癌、自殺發生機率較一般人口為低時指出，由於不同消防員有不同的服務年期（少於3個月、大於3個月但少於10年、10年至20年、20年以上），該研究按上述志願者服務年期區間收集這些男性消防員志願者患癌、自殺的數據，通過計算上述服務年期區間所收集的癌症、自殺統計作觀察值，比對他們的預期平均患癌、自殺數字，從而計算出不同服務年期區間癌症、自殺標準化發生比，發現服務年期區間越長，患癌、自殺SIR值越低，體現健康志願者效應（“healthy

^①經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和終審法院對廢票的覆核，澳門半島的直選有效票數（不計算理工學院）與作者在票站外公佈所收集的數字相差15票，僅佔總有效票數的0.012%，各候選人的排名不變，也不對研究的分析結果構成顯著影響。

^②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

^③ P. Dorian Owen, Michael Ryan, Clayton R. Weatherston, “Measuring Competitive Balance in Professional Team Sports Using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31 (2007), pp. 289-302.

^④ Christian Fuchs, “The Google and Facebook Online Advertising Duopoly,” in Christian Fuchs, *The Online Advertising Tax as the Foundation of a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A CAMRI Extended Policy Report*,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pp. 11-19.

-volunteer” effect) 有助減少患癌、自殺的機率。^①此外，也有其他學者利用 SIR 值進行相似的研究，如 M. Boniol、A. Koechlin、T. Sorahan 等通過計算 SIR 值分析 1975 年後英國和瑞典從事橡膠製造業人士患癌的情況。^②

本文將參考上述的研究，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劃分的澳門半島堂區標準（包括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望德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以及氹仔和路環，按票站的實際地理位置劃分成七大堂區。上文所述澳門七大堂區人口特徵，無論在人口規模大小、人均年齡、職業、收入、學歷、出生地等因素均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些因素對各組別堂區得票的情況將有所影響，導致各組別在不同堂區“吸票”和競爭力的差異。

本文根據立法會選舉官方網站資料，把 2013、2017 及 2021 年直選投票站分別歸入七個區域。本文在處理各區域有效票數時，各屆均剔除了監獄的有效票數，^③2017 和 2021 年剔除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的票站，^④2021 年則加上剔除三個流動投票站的有效票數。^⑤當中，本文將側重以本屆（2021 年）當選組別為主要分析對象並對其進行區域性分析。

根據 2013、2017 和 2021 年三屆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站分佈，其主要依據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分區分佈，即基本每一統計分區將設有一個或以上的票站，^⑥而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一般按選民申報的常居住址，為選民安排附近票站投票，而部分處於區域邊界的投票站，將按其覆蓋的範圍、該區投票站數量和選民人數作適當調整，即地理位置處於某一堂區的票站，另一堂區的選民也可能在此投票。^⑦總體上過往三屆的投票站位置基本保持較高的重覆性，變化不大。

堂區得票 SIR 值計算方面，首先將直選中各當選組別的堂區得票數字，即區域得票數作為觀察值（observed value），由於 2013、2017 及 2021 年的澳門立法會直選分別有 20、24 及 14 個組別參與；假設各組別獲取選票機率相同的情形下，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堂區有效得票總數除以參選組別數），就是各組區域得票的預期值（expected value），通過計算各當選組別區域實際得票數（觀察值）與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預期值）比例，將

^① Deborah C Glass, et al., “Mortality and Cancer Incidence among Male Volunteer Australian firefighters,”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line, 8 April 2017, p. 4.

^② M. Boniol, et al. “Cancer Incidence in Cohorts of Workers in the Rubb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rst Employed since 1975 in the UK and Sweden,”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 6 January 2017, p. 1.

^③ 由於監獄內投票的均為在囚人士，其投票取向與所在的區域（路環）的社經背景或總體人口特徵等關係不大，而 2013、2017 及 2021 年監獄內的投票人數僅為 250 人、226 人和 280 人，佔投票總人數不足 0.3%，因此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甚微，可忽略不計。

^④ 由於 2017 及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委會安排所有符合間選的直選選民，統一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進行直選和間選投票，這與路環監獄的情況相同，未能推斷其所居住之區域，這票站佔投票總人數分別為 3.1%（2017 年）和 5.2%（2021 年），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較輕，故忽略不計。

^⑤ 與剔除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的原因相同，2021 年立法會選舉，於三個流動站投票的投票人數合共僅佔總投票人數的 0.06%。

^⑥ 統計分區是以堂區的範圍作細部劃分，澳門半島五個堂區分為 17 個統計分區。氹仔和路環則分別劃分為 5 個和 1 個統計分區（未計算“路氹填海區”及“新城 A 區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管理區”）。

^⑦ 此可視為本研究在統計上的一個限制。

能得出標準化發生比。^①如組別堂區得票 SIR 值高於 1，即該組在該堂區得票高於整體平均值，“吸票”能力相對較其他組別為高，SIR 數值越高，表示該組別在該堂區競爭優勢越為明顯。相反，如組別堂區得票 SIR 數值少於 1，即表示該組別未能獲取該堂區整體平均值的票數，“吸票能力”相對較弱。本文根據本屆當選組別把其背景劃分為、鄉族（商界）、傳統社團、公務員／土生葡人和及專業界別四大界別作闡述探討。

三、結果分析

（一）總體情況

本屆登記選民人數為 323,907，較上屆（2017 年）增加了 18,292 人，有效票數由上屆 172,628 減少至 137,279，與 2013 年立法會直選有效票數相若（146,518），總體投票率則下降至 42.38%。本屆直選組別“澳門民聯協進會”（下稱“民聯”）以 6,649.75 張有效選票獲取最後一個直選議席，較上屆的議席門檻減少 1,698 票；並與 2013 年議席票數門檻相若（6,565 票）。本屆共有 7 組直選組別取得議席，較上屆（2017 年）減少了 5 組。

選情方面，根據總核算委員會有關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總核算最終結果》顯示，本屆直選票源的分佈相對集中，獲取議席的組別除了“傳新力量”外，其餘 6 組的得票率均超過 10%。其中，“民聯”的得票率更超過 20%（20.14%）。“同心協進會”（下稱“同心”）的得票率亦超過 15%（17.99%）；其餘取得議席的 4 組，得票率處於 10 至 14%，與 2013 年立法會直選的得票率分佈特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②而由於 2017 年立法會直選參選組別數目較多，並沒有一組取得超過 10% 的得票率。

（二）競爭與集中度

本文採用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分析上述三屆立法會直選組別票數分佈（得票率）的集中程度。

2013、2017 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票源分佈的 HHI 分別為 955.65、672.72 和 1,383.45，數值少於 1,500，反映具有一定的競爭性，^③不存在寡頭壟斷的情況。但上述數值反映本屆的競爭較上兩屆有所下降，得票率集中程度較高。同時，本文通過計算立法會直選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分析上述三屆立法會直選組別競爭程度的差異。2013、2017 及 2021 年的組別得票率標準差分別為 0.05、0.03 和 0.07，反映本屆組別得票的差異度較大，競爭程度相對較往屆低。

^①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 Deborah C. Glass, et al., “Mortality and Cancer Incidence among Male Volunteer Australian firefighters,” *Occup Environ Med*, published online, 8 April 2017, p. 1-5.

^② 2013 年有 3 個直選組別：“澳門民聯協進會”、“澳粵同盟”和“群力促進會”的得票率均超過 10%。

^③ HHI 數值越高，集中程度越高，競爭越低，詳見：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https://www.justice.gov/atr/horizontal-merger-guidelines-08192010>.

接續進一步以組別得票的 SIR 值（組別實際票數^①／組別預期票數^②）來判斷各組別在近三屆選舉“吸票”能力的高低。同時，通過計算取得最後一個議席票數與預期票數的 SIR 值，在不受投票率等因素的影響下，客觀地體現組別取得議席門檻所需具備的“吸票能力”程度。

2013、2017 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組別取得議席門檻的 SIR 值分別為 0.90、1.16 和 0.71。^③由於澳門立法會直選使用改良漢狄法（Modified d'Hondt Method），把組別取得票數轉換成取得議席數，基本規則是把每組所取得票數除以一、二、四、八，以幾何級數如此類推，然後將得出的數字分配予該組別名單上排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候選人，如此類推。回歸後歷屆選舉，一組候選人最多是第三位的候選人（即所得票數除四）能成功當選，因此，直選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數值越高，選舉競爭程度越低，相對地取得議席門檻的 SIR 值亦會有所下降。

本屆選舉中，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值為 0.07，相較於上屆（0.03）上升 0.04，反映本屆各組得票較上屆集中。本屆直選組別整體 SIR 值只需要達到 0.71 或以上，即參選組別獲取比平均每組預期所得選票數（9,433 票）低出 29%，仍能取得議席，較上屆 SIR 的門檻值（1.16）大幅下降，與 2013 年相比，取得議席的 SIR 門檻值也較低。為此，本屆出現一較為特別的情況，即在競爭性程度相對較低，得票率集中程度較高的情形下，反而組別得票的 SIR 門檻值大幅下降（較往屆取得少的票數但仍能獲得議席），這很大程度歸因於澳門立法會直選使用改良漢狄法之故。

（三）組別的總體“吸票”能力及區域性分析

本文針對 2021 年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當選組別（共 7 組）的得票進行分析，^④並分別與 2013 年及 2017 年立法會直選結果作比較；由於組別“傳新力量”和“美好家園聯盟”（下稱“好家園”）只參與了 2017 年及 2021 年立法會直選，故這 2 組只能以過往 2 屆的區域性得票 SIR 值作比較；另外，社團“民眾建澳聯盟”（下稱“民聯”）在參與 2017 年立法會直選時分拆成“澳門民眾協進會”和“澳門民聯協進會”2 個組別。因此，在比較“民聯”上述三屆區域性得票 SIR 值時，分拆組別的票數將會進行加總，然後才計算其區域性得票 SIR 值。

（1）總體“吸票”能力分析^⑤

每一屆的澳門立法會直選參選組別數量、有效票數、投票率均有所不同，整體得票

^① 組別實際得票數據來源至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總核算結果，網址：<https://www.eal.gov.mo/pdf/2021/final/FinalRptD03.pdf>。

^② 組別預期票數等於總有效票數除以參選組別數目。

^③ 2021 年“民聯”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第三個議席，按改良漢狄法（Modified d'Hondt method）計算，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2.82/4=0.71$ ；2017 年“同心”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兩個議席，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2.32/2=1.16$ ；2013 年“新希望”取得最後一個議席，該組取得兩個議席，取得議席門檻 SIR 值應為 $1.80/2=0.90$ 。

^④ 本研究對象為當選組別，因此下表的研究結果僅顯示當選組別的整體和各區域得票情況。

^⑤ 整體性分析包括路環監獄、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和三個流動投票站的有效票數。

SIR 值，即組別實際得票與平均得票之間的比例，可反映各當選組別整體競爭力的變化。本屆當選組別 SIR 值，只有“傳新力量”低於 1，其餘 6 組當選組別整體 SIR 值均為 1.5 或以上，當中“民聯”和“同心”整體 SIR 值均大於 2；相對於 2013 及 2017 年立法會選舉，本屆大部分當選組別吸票能力相對較強，從整體得票 SIR 值來看，具有較長“參選年資”的鄉族（商界）社團；傳統社團；具有公務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的組別，其在競爭優勢上相當明顯。

福建籍候選人為背景的“澳門民聯協進會”為本屆最高得票組別（整體 SIR 值為 2.82），但與上屆有所不同，該組別上屆分拆為“澳門民聯協進會”及“澳門民眾協進會”，並由施家倫和宋碧琪分別作為第一候選人，兩組合計的 SIR 值總和為 3.47，而本屆的 SIR 值也較其 2013 年所取得的為低（當屆 SIR 值為 3.61）。此外，作為上屆最高得票組別，具鄉族（商界）背景的“澳粵同盟”，本屆得票率雖然較上屆有所提升，但整體得票 SIR 值由上屆的 2.39 下降至 1.78，反映其競爭力有所下降，只成為最高得票組別的第四位。

傳統社團方面，本屆“同心”成為得票率第二高的組別，整體得票 SIR 值（2.52）較過往兩屆 2017 年和 2013 年為高，反映在新冠疫情經濟放緩下，傳統代表勞工及基層、關注就業問題的“同心”，其“吸票”能力有所提升。同時，本屆“同心”得票與另外兩個傳統社團背景組別“群力”和“好家園”也有較大的差距，上述 2 個組別本屆整體得票 SIR 值分別為 1.60 和 1.51，雖然“群力”本屆得票率較上屆上升了 4.32%，但整體得票 SIR 值較上屆減少了 0.12，反映在票源相對集中的程度下，“群力”的競爭力較上屆有所降低。^①相反，“好家園”本屆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提升，因而取得了多一個議席。

作為公務員和土生葡人族裔利益代表的組別“新希望”，雖然本屆整體得票 SIR 值較上屆略有下降，但在本屆整體得票率（13.8%）高於上屆（8.33%）的情況下，該組較上屆取得了多一個議席。最後，具專業界別背景的“傳新力量”，其得票率由上屆 4.15% 躍升至 6.64%，成功獲得一個議席。（表 4、5、6）。

**表 4 2021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
（按得票順序）**

| 組別 | 第 3 組 澳門民聯協進會 | 第 11 組 同心協進會 | 第 14 組 新希望 | 第 1 組 澳粵同盟 | 第 8 組 群力促進會 | 第 9 組 美好家園 聯盟 | 第 6 組 傳新力量 |
|--------|---------------------|-----------------|---------------|---------------|----------------|---------------------|---------------|
| 背景 | 鄉族（商界） ^② | 傳統社團 | 公務員／土生 | 鄉族（商界） | 傳統社團 | 傳統社團 | 專業 |
| 整體得票率 | 20.14% | 17.99% | 13.80% | 12.73% | 11.43% | 10.78% | 6.64% |
| 整體 SIR | 2.82 | 2.52 | 1.93 | 1.78 | 1.60 | 1.51 | 0.93 |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① “群力” 2021 年整體得票 SIR 值未能直接與 2013 年比較，2013 年“群力”整體得票 SIR 值為 2.16，但當屆該組第一及第二候選人分別是來自“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的何潤生和黃潔貞，其後於 2017 年立法會選舉，黃潔貞代表直選組別“好家園”成為第一候選人下，“群力”被分拆成兩組，使得其“吸票”能力有所下降。

^② 本屆候選人組別較過往兩屆有所變化，背景上淡化了商界的元素，但為與過往屆別作整體分析，且其仍以“鄉族背景”為其重要的群眾基礎，因此保留使用鄉族（商界）。

**表 5 2017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
(按得票順序)**

| 組別 | 第 20 組 澳粵 同盟 | 第 16 組 同心 協進會 | 第 9 組 澳門民聯 協進會 | 第 6 組 新希望 | 第 2 組 群力 促進會 | 第 13 組 民主 新動力 | 第 14 組 澳門發展 新連盟 | 第 8 組 澳門民眾 協進會 | 第 3 組 民主昌 澳門 | 第 4 組 公民 監察 | 第 11 組 美好家園 聯盟 | 第 7 組 學社 前進 |
|--------|--------------------|---------------------|----------------------|--------------|--------------------|---------------------|-----------------------|----------------------|--------------------|-------------------|----------------------|-------------------|
| 背景 | 鄉族 (商界) | 傳統 社團 | 鄉族 (商界) | 公務員 ／土生 | 傳統 社團 | 民主派 | 博彩業 (商界) | 鄉族 (商界) | 民主派 | 專業 | 傳統 社團 | 民主 派 |
| 整體得票率 | 9.97% | 9.67% | 8.62% | 8.33% | 7.15% | 6.59% | 6.05% | 5.85% | 5.84% | 5.56% | 5.50% | 5.34% |
| 整體 SIR | 2.39 | 2.32 | 2.07 | 2.00 | 1.72 | 1.58 | 1.45 | 1.40 | 1.40 | 1.33 | 1.32 | 1.28 |

表格來源：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54 頁。

**表 6 2013 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的整體得票率及整體得票 SIR 值
(按得票順序)**

| 組別 | 第 13 組 澳門民聯 協進會 | 第 8 組 澳粵 同盟 | 第 14 組 群力 促進會 | 第 9 組 新希望 | 第 1 組 澳門發展 新連盟 | 第 6 組 同心 協進會 | 第 19 組 民主昌 澳門 | 第 5 組 民主 新澳門 | 第 12 組 改革創新 聯盟 |
|--------|-----------------------|-------------------|---------------------|--------------|----------------------|--------------------|---------------------|--------------------|----------------------|
| 背景 | 鄉族 (商界) | 鄉族 (商界) | 傳統 社團 | 公務員 ／土生 | 博彩業 (商界) | 傳統 社團 | 民主派 | 民主派 | 博彩業 (商界) |
| 整體得票率 | 18.04% | 11.09% | 10.79% | 8.96% | 8.94% | 8.16% | 7.50% | 6.02% | 5.98% |
| 整體 SIR | 3.61 | 2.22 | 2.16 | 1.79 | 1.79 | 1.63 | 1.50 | 1.20 | 1.20 |

表格來源：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 年第 4 期，第 54 頁。

(2) 組別背景與區域性分析

每一屆取得議席組別區域性得票 SIR 值，即組別在某一堂區實際得票與堂區平均得票之間的比值，可反映該組別在此堂區（而非整體澳門的）“吸票”和“競爭能力”。不同組別在各區域 / 堂區得票 SIR 值的差異，正好說明區域因素對各組票源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本文以 2021 年立法會當選組別為視角，分析不同組別各堂區得票的 SIR 值，並與 2017 及 2013 年作比較，以分析其在過去三屆不同堂區 SIR 值的變化。本文採用 T—檢定 (Student's t-test)，分別對 2021 及 2017 年（本屆和上屆）、2017 及 2013 年（上屆和前屆）不同組別各堂區得票 SIR 值進行檢測，探討組別前後兩屆之間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是否存在顯著差異。T—檢定適合少量樣本，並假設兩個數列樣本為隨機變量、母體依從常態分佈和樣本之間為獨

立變項下（即2017年組別的堂區 SIR 值結果不會影響到2021年的結果），建立虛無假定（null hypothesis），即兩屆之間該組別各堂區 SIR 值樣本平均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當 P 值少於 0.05，表示否定虛無假定，即存在顯著差異。

本屆在剔除路環監獄、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以及三個流動票站的有效票數後，花地碼堂區佔總有效票數比例接近一半（48.11%），與過往兩屆的比例相若，該堂區成為了各組別的“必爭之地”。本屆除了“傳新力量”在各當選組別中的 SIR 值低於 1（即區域的平均值）外，其餘當選組別 SIR 值均大於或等於 1.2。其中擁有較強烈鄉族背景並取得 3 個議席的“民聯”，在該堂區的得票 SIR 值更高達 4.11，雖然 SIR 值較上屆為低，但該組在花地碼堂區相對其他組別在吸票能力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且與其他當選組別差距甚大。該組在其餘堂區的得票 SIR 值，除了望德堂和風順堂外，其餘 4 個堂區均高於 1.7 或以上，該組在“大票倉”取得相對優勢下整體競爭能力自然較佳。而 T—檢定的結果顯示，本屆與上屆、上屆與前屆該組別的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反映該組別在各堂區“吸票”能力並未有太大變化，不論是票源或相對競爭力仍然主要集中在花地碼堂區（表 7、8）。

代表傳統社團組別的“同心”在本屆成功取代了另一鄉族（商界）背景的“澳粵同盟”，成為該堂區取得第二多票數的組別。“澳粵同盟”本屆在該堂區得票 SIR 值 1.78（減少 0.69），其餘的堂區 SIR 值均較上兩屆有所減少。該組別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分別為 0.13 和 0.23，反映該組堂區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可以推論，在整體各區“吸票”的能力比重沒有明顯調整，而本屆票源集中度提高的情況下，該組別整體競爭能力相對有所下降。

傳統社團組別的“同心”、“群力”及“好家園”，本屆在花地碼堂區的 SIR 值分別為 2.36、1.63 和 1.20，“同心協進會”在該堂區得票 SIR 值較上兩屆均有所提高，並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同時，除氹仔外，該組其餘堂區得票 SIR 值均接近或高於 2，與上屆的“吸票”能力相若。比較“同心”在這三屆各堂區 SIR 值分佈，其 T—檢定 P 值分別為 0.03 和 0.38，即該組別的堂區 SIR 值區域分佈在 2017 與 2013 年存在顯著差異；而 2021 與 2017 年則不存在顯著差異。可以說，結合其整體 SIR 值大幅度提高（2013 年為 1.63，2017 年為 2.32），即 2017 年其“吸票”能力比重出現變化的同時，整體各區的競爭力也有較大提高。而本屆與上屆的堂區 SIR 值分佈不存在顯著差異，說明在各區的“吸票”比重保持穩定，但整體 SIR 值提升至 2.52，反映其總體競爭力進一步提升。

另一代表傳統社團組別的“群力”，附了氹仔外，其餘堂區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下跌，本屆各堂區 SIR 平均值 1.48，較上屆 1.70 為低。該組別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分別 0.29 和 0.01，與組別“同心”檢定結果相同，但不同之處是，由於上文所述，2017 年該組別已分拆成兩組參選，使各堂區 SIR 平均值由 2013 年的 2.37 大幅度下降至 1.70，而這 3 屆該組別堂區 SIR 平均值亦呈下降之趨勢，反映該組別的競爭能力正在下降。另一組“美好家園聯盟”，本屆在傳統票倉花地碼堂區 SIR 值為 1.2，較上屆

0.98 有所提升，除了路環外，其餘堂區 SIR 值均較上屆有所上升，該組別 2021 與 2017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為 0.44，並未存在顯著差異，顯示其在各區“吸票力”的比重在兩屆相若。

具公務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的“新希望”，該組別三屆堂區平均 SIR 值分別為 2.37、2.47 和 2.36，數值相對穩定，而其在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各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分別為 0.68 和 0.8，沒有存在顯著差異。在三屆的選舉中，該組別票源均相對集中於望德堂區、大堂區和氹仔區，以本屆為例，其得票 SIR 值在該三區分別達 2.85、2.64 和 3.11，而在傳統票倉花地碼堂區 SIR 值為 1.52，均較上兩屆取得較佳的成績。

本屆只有一組界定為專業背景的組別“傳新力量”獲得直選議席（一個），該組別在 2021 與 2017 年堂區 SIR 值分佈 T—檢定 P 值為 0.72，沒有存在顯著差異，該組別在傳統票倉花地碼堂區 SIR 值只有 0.72，而在風順堂區、路環的 SIR 值亦少於 1，顯示其在該區競爭優勢不強，相對地，其在望德堂區（SIR 值為 1.23）和氹仔（SIR 值為 1.37）擁有較佳的競爭優勢。本屆“傳新力量”在各堂區的平均 SIR 值為 1.06，較上屆輕微上升，為此，在本屆票源集中程度相對提高的情況下，堂區競爭能力輕微提升有助該組成功取得一個議席。

表 7 本屆當選組別於 2021、2017 及 2013 年立法會直選堂區得票 SIR 值分佈

| 年份 | 堂區 | 有效票數比例 | 堂區票數 SIR 平均值 | 澳門民聯協進會 | 澳粵同盟 | 同心協進會 | 群力促進會 | 美好家園聯盟 | 新希望 | 傳新力量 |
|------------------------|------|--------|--------------|---------|--------|-------|-------|--------|--------|------|
| | | | | 鄉族（商界） | 鄉族（商界） | 傳統社團 | 傳統社團 | 傳統社團 | 公務員／土生 | 專業 |
| 2021 年立 法會 直選 | 花地碼 | 48.11% | 1.90 | 4.11 | 1.78 | 2.36 | 1.63 | 1.20 | 1.52 | 0.72 |
| | 聖安多尼 | 23.54% | 1.86 | 1.71 | 2.14 | 2.82 | 1.56 | 1.66 | 2.02 | 1.11 |
| | 望德堂 | 5.06% | 1.84 | 1.20 | 1.62 | 2.49 | 1.34 | 2.15 | 2.85 | 1.23 |
| | 大堂 | 4.66% | 1.81 | 2.22 | 1.63 | 1.92 | 1.25 | 1.84 | 2.64 | 1.19 |
| | 風順堂 | 7.85% | 1.86 | 1.36 | 2.16 | 3.01 | 1.70 | 1.45 | 2.35 | 0.96 |
| | 氹仔 | 8.35% | 1.81 | 1.83 | 1.10 | 2.04 | 1.30 | 1.92 | 3.11 | 1.37 |
| | 路環 | 2.43% | 1.89 | 3.21 | 1.82 | 1.63 | 1.59 | 2.04 | 2.08 | 0.86 |
| | 平均值 | - | 1.85 | 2.23 | 1.75 | 2.32 | 1.48 | 1.75 | 2.37 | 1.06 |
| | 花地碼 | 47.06% | 1.70 | 5.01 | 2.47 | 2.11 | 1.69 | 0.98 | 1.44 | 0.83 |
| | 聖安多尼 | 24.79% | 1.69 | 2.18 | 2.76 | 2.70 | 1.67 | 1.47 | 2.19 | 1.17 |
| | 望德堂 | 5.44% | 1.68 | 1.49 | 1.88 | 2.10 | 1.48 | 2.00 | 3.25 | 1.27 |

| | | | | | | | | | | |
|------------------------|------|--------|------|------|------|------|------|------|------|------|
| 2017 年立 法會 直選 | 大堂 | 4.68% | 1.68 | 3.25 | 1.95 | 1.69 | 1.40 | 1.70 | 2.75 | 1.01 |
| | 風順堂 | 8.51% | 1.68 | 1.56 | 2.84 | 2.49 | 1.78 | 1.22 | 2.36 | 1.04 |
| | 氹仔 | 7.77% | 1.65 | 2.42 | 1.28 | 1.73 | 1.24 | 1.66 | 3.39 | 1.37 |
| | 路環 | 1.76% | 1.77 | 4.06 | 2.96 | 1.59 | 2.65 | 2.16 | 1.88 | 0.55 |
| | 平均值 | - | 1.69 | 2.85 | 2.31 | 2.06 | 1.70 | 1.60 | 2.47 | 1.03 |
| 2013 年立 法會 直選 | 花地碼 | 44.11% | 1.94 | 5.12 | 2.29 | 1.51 | 1.87 | - | 1.19 | - |
| | 聖安多尼 | 27.21% | 1.89 | 2.64 | 2.50 | 1.99 | 2.45 | - | 1.84 | - |
| | 望德堂 | 7.83% | 1.87 | 1.85 | 1.89 | 1.57 | 2.54 | - | 2.75 | - |
| | 大堂 | 4.71% | 1.85 | 2.70 | 1.66 | 1.27 | 2.40 | - | 2.54 | - |
| | 風順堂 | 9.33% | 1.88 | 2.01 | 2.34 | 1.71 | 2.21 | - | 2.16 | - |
| | 氹仔 | 6.42% | 1.81 | 2.49 | 1.21 | 1.27 | 2.17 | - | 3.45 | - |
| | 路環 | 0.38% | 1.82 | 2.09 | 1.44 | 1.01 | 2.92 | - | 2.56 | - |
| | 平均值 | - | 1.87 | 2.70 | 1.91 | 1.48 | 2.37 | - | 2.36 | - |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表 8 本屆當選組別 2021 與 2017 年、2017 與 2013 年堂區選票 SIR 值分佈
T—檢定結果**

| T-檢定 | 澳門民聯 協進會 | 澳粵 同盟 | 同心 協進會 | 群力 促進會 | 美好家園 聯盟 | 新希望 | 傳新 力量 |
|---------------------------|-------------|----------|-------------|-------------|------------|------|----------|
| P-Value (2021 vs 2017) | 0.28 | 0.13 | 0.38 | 0.29 | 0.44 | 0.68 | 0.72 |
| P-Value (2017 vs 2013) | 0.66 | 0.23 | 0.03 | 0.01 | - | 0.8 | - |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四、選舉結果的啟示

透過對當選立法會議員組別得票進行區域性分析，可見候選組別的背景與區域因素對各組別的選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上述三屆立法會選舉中所有的當選組別，其區域得票 SIR 值大小可反映組別之間“吸票”能力的差異；而按組別背景性質劃分，特別是具鄉族和公職人員背景組別，在某一區域的得票三屆均相對突出，且“吸票”能力的區域比重沒有顯著改變。因此，結合區域社經背景特徵和相關組別的政綱，可初步勾勒出不同組別與選民投票意向之關係。

一般來說，花地瑪堂區被認為是澳門基層市民聚居的區域，也是傳統社團開展民生和街

區工作的重點區域，從區域性得票角度分析，近三屆具鄉族（商界）背景的組別在花地瑪堂區具有很高的“吸票”能力，其 SIR 值介乎 1.78 至 5.12；而傳統社團在該區的 SIR 值則普遍低於 2，雖然 2017 年和 2021 年選舉中，傳統社團在花地瑪堂區的 SIR 值有所提高，但已很大程度上反映傳統社團原來以代表勞工與基層利益的優勢已逐漸減退，需要尋求新的票源增長點。同時，在澳門經濟發展快速下，中產家庭增加對傳統社團的選情構成一定的影響，例如自 2017 年從“群力促進會”分拆出來，以婦女聯合總會為社團背景的“美好家園聯盟”，其在相對較多中產人士居住的望德堂區和氹仔區取得較突出的成績，政綱也較側重於家庭友善和婦幼政策。

雖然從區域社經特徵來看，從事博彩業的勞動人口較多居住於花地瑪堂區，而 2013 和 2017 年兩屆部分具博彩（商界）背景組別也在政綱中突出對博彩從業員利益的關顧，但未能在此區獲得明顯的得票優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縱然過往三屆直選當選組別中，不少具有商界背景，但他們均在政綱或宣傳上較少提及商界利益，當中，鄉族（商界）背景組別在政綱中持續強調對民生議題的關注，注重強化社會保障的服務，經濟成果的分享，關注弱勢社群的利益，也在財政支援上傾向關懷老弱，例如其中一鄉族社團的政綱多年前已提出“全民基金”，又例如其中一個鄉族社團持續多年贈予長者敬老金和禮品包，淡化其商界背景的色彩。而具有鄉族或族群背景的組別，他們並沒有在政綱和宣傳上強化有關元素，反之致力吸納不同鄉族和群體的選票，加入年輕和專業人士的候選人，展現年輕化和專業化的力量。

普遍認為，中產和年輕選民對專業界別背景的的選情相對有利，而從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區域性得票分析來看，相關組別的確在本地出生和專業人士比例較高的望德堂區和氹仔區擁有一定的優勢。

而具公職人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組別，其政綱中相對較大篇幅針對公職人員的權益，也是少有組別提供葡語的政綱或宣傳資料，反映對公職人員和葡裔人士的重視，在得票上也傾向獲得中產和年輕選民支持；三屆選舉中其在氹仔、望德堂的得票相對突出，其三屆氹仔區域得票 SIR 值在保持在 3.0 以上，而在相對較多土生葡人居住的大堂區，也取得較佳成績。

總括來說，過往三屆各當選組別在區域性得票分佈呈現較高的穩定性，但不能忽略的是，近年花地瑪堂區和路環區建成眾多大型屋苑和公共房屋群，花地瑪堂區的面積廣闊，當中如東方明珠區集聚了不少中產人士居住，其居住人口的社經背景將展現持續的變化，另外由於不少選民未有及時更改地址，路環的居住人口大幅度提高至 32,300 人（佔澳門人口的 4.73%），但其投票有效票數佔整體仍相對很低（由 2013 年的 0.38% 提高至 2021 年的 2.52%），預期未來將成為一個新興的票倉，或對各組的區域性得票產生“洗牌”效應。

再者，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然相對接近，傾向包羅萬有和依據當前熱點議題的情形下，本文從實證角度分析當選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分佈，發現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具有一定的連繫性，但未能確定具強烈的關係，例如同為傳統社團，相似背景的組

別在不同區域的票數差異不低，體現選民投票取向相對較重視候選人的過往政績，^①又或是該社團自身（獲得議席的組別基本也有對應的社團支持），且可以看出，除了少數情況外，整體三屆各組別的區域“吸票”和“競爭力”分佈保持了較高的穩定性，也可理解為在澳門的政治環境下，選民的忠誠度相對較高，然而，在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情形下，選民投票的意向和目標是否能長期保持穩定性，而候選組別在未來選舉將淡化組別背景的因素，又或強化對特定群體的針對性，值得進一步的關注。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例如在 2005 年進行的兩次電話問卷調查顯示，市民在選擇立法會候選人時的考慮因素當中，過往政績均在各項因素中排第二位，見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市民置業（2005 年 4 月 25 日—30 日）；“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公共服務事業調查（2005 年 8 月 29 日—9 月 1 日），<http://hkupop.hku.hk/>。